

抗战时期南洋华侨延安印象的建构与传播*

吕 霞

摘要:南洋华侨首先认同的是其原乡故土,对位于中国西北的延安知之甚少。面对空前国难,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中心的地位也逐渐得到华侨的认可。南洋华侨延安印象的建构,既受来自进步报刊书籍、团体组织以及华侨学校与家庭的影响,延安的真实政治生态与社会状况逐渐为华侨所了解。不少华侨历经艰辛前往延安,参与到延安印象的传播之中。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对延安印象的宣传,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洋华侨延安印象的建构与传播,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实践抗战救国这一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的正向反馈。

关键词:抗战时期;南洋华侨;延安印象;政治符号

作者吕霞,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华侨华人史。地址:广州市,邮编510800。

在早期的跨境迁移中,华侨将地域作为确定其身份归属的最初标准,与地域关系密切的宗亲组织是华侨在海外安身立命的依仗。南洋华侨绝大多数来自闽粤地区,所认同的是原乡故土,与远在中国西北的延安原本交集不大。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却成为不少华侨念兹在兹的地方。学术界关于延安的研究成果斐然,从中国共产党选择延安、全方位建设延安到塑造延安形象、联结与到达延安的华侨关系等都有不少研究^①,但就聚焦于“延安印象”本身,除外国记者的叙事外,从“他者”角度来探讨延安印象的则相对较少。原本作为地理概念的延安,为何能成为华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继而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其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华侨认同延安印象的建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南洋华侨延安印象认知变化的历史考察,追溯延安印象的建构路径,呈现南洋华侨对延安的实践感知以及对延安印象的传播。

*基金项目:202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时势转移与新马华侨的政治认同(1840—1965)”(项目号:GD21CHQ03)的阶段性成果。

①延安在中共党史与抗战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兹列举对本文关于南洋华侨与延安印象写作有重要启发性的成果:[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美]周锡瑞著,石岩译:《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杨东:《循名责实——“延安”的概念史及其在战时的建构表达》,《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王海军:《“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多重叙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陈文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八桂侨刊》2009年第3期;向大有:《论中共的华侨身份属性理念及中共与华侨的关系特征》,《八桂侨刊》2021年第2期;等等。

一、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认知

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特殊时期,延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见证。在这一时期中,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认知历经了从地理概念到民族故乡,再到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变化,延安也历经了从地理区划到民族象征,再到政治符号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南洋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逐渐加深的过程。

(一)初识:作为地理概念的延安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北连榆林,南接关中,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等地相望,西邻甘肃庆阳。环顾其周遭,因山脉与黄河的影响,除南下关中外,地理交通不甚便利。延安又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常年降雨量稀少,农林经济发展缓慢。南洋华侨以闽粤民众为主,虽然也有来自湖南、湖北、广西、云南、浙江等地的民众,但从地理区域上而言,这些都属于中国的南方地区。因为地理距离的遥远,南洋华侨对延安存在天然的陌生感。地处西北的延安似乎是比南洋更难企及的地方,乘船前往南洋仅需数日,而前往西北则需要借助火车、汽车、步行甚至畜力,耗费的时间成本也更多。

除冯玉祥的西北军外,延安或者说西北这片地域的军事与政治意义,在当时政局中似乎并不突出。戴季陶在谈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家态势时曾说,百年来的“革命史”颠倒了数千年来文化自北向南的传播路线,原本以“南蛮”形象出现的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根据地,而曾经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的西北则成为相对落后的方^①。在南洋社会中,尽管自20世纪以来新闻业发展迅速,但延安在当地报刊中出现的频次很低。在有限的信息传播中,不少华侨对延安与西北存在很大的误解:“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共产党的地方,那是个穷得连一根草都不长的地方,你们会饿死的!”^②这似乎是南洋华侨对西北最初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很早即已注意到西北的特殊性。国民革命失败后,刘志丹等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在西北创立了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先后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与陕北苏维埃政府,后发展壮大为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会师,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③。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下设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其辖区包括延安在内的30余县。在毛泽东看来,“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好得多,有汽车,还有飞机场,是陕北的大城市”^④。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由此开启延安历史的新时期。

(二)再识:作为民族故乡的延安

南洋华侨何以对远在西北的延安产生深刻的印象,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民族故乡在西北”的话语塑造密切相关^⑤。西北在中国历史上的荣光很容易调动起民众包括华侨在内的民族认同感。王赓武曾经

^①戴传贤:《荡平西北逆军的两大意义》,《中央周报》1930年第111期,第4页。

^②王建华:《冲破束缚,奔向延安》,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159页。

^③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④贺清华:《跟随毛主席在陕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0页。

^⑤李立敏:《竞塑“故乡”——1930年代国共两党围绕“民族故乡”的形象塑造与话语竞争》,《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3期。

指出，“有关中国过去的传说和对于或多或少有些抽象的中华文化‘大传统’感到自豪的理由”可以强化华侨的历史认同^①。随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以及对华北的虎视眈眈，西北的战略地位日渐凸显。国民党甚至有将洛阳作为行都，将西安作为西京的打算。将西安作为陪都正是考虑到其在历史、地理以及国家将来的需要，战略地位的重要性^②。1934年10月，蒋介石在西安的讲演中指出：“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地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③。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西北话语的表达中也多强调西北“秦汉唐宋”的历史以及“炎黄子孙”的身份，并逐渐明晰“边区是黄帝子孙发祥的圣地”“边区还留有黄帝的圣墓”^④的话语表达。在关于西北民族话语建构的陈述中，位于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的黄帝陵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南洋华侨而言，尽管其多来自闽粤地区，但从血脉源流上而言，关中、中原地区是这些华侨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而这点在其家谱与族谱中有不少记载。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环境下，强调西北作为民族故乡的价值意蕴，对培养华侨的中华民族意识有着重要意义。对黄帝陵的祭拜也成为凝聚侨心的重要方式。1937年清明，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林伯渠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祭文中称颂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之后即顺势提出对时局的政治宣言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民族战线的救国良方，表达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⑤。

延安与黄帝陵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延安形象塑造的结果。美国学者周锡瑞认为，“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突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意外”，“陕北只是长征行军途中若干拟定目的地中的最后一个”，且毛泽东无意在陕北常驻，因该地“过于贫穷，人口也太少，支撑不了他的革命抱负”^⑥，故而称延安为“意外的圣地”。但延安的地缘优势在于，黄帝陵所属的中部县属于陕甘宁边区的边缘地带，且黄帝陵位于西安到延安的必经路线上。从西安乘车北上，过云阳、耀县、中部、洛川后到达延安。前往延安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被认为是“中国的最老的坟”的黄帝陵，同样北上的华侨青年也很难忽视这一地标。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对边区封锁还比较松动之际，前往延安的华侨青年基本上都会在黄帝陵前祭拜，这些“在海外一贯以黄帝子孙自豪的华侨青年，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去爬登高山，拜谒黄帝陵。站在轩辕黄帝陵墓前，向着祖国大好河山，和同路的青年同伴们一道放声高唱抗大和陕公校歌”^⑦，而陕北公学校歌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⑧在潜移默化中，华侨对民族故乡的认识发生了“民族故乡在西北”到“民族故乡在延安”的转移。

（三）深识：作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延安

作为民族故乡的西北承载了华侨的民族情怀，但随着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入侵的步步加深，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战救国。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曾宣布抗战建国，并建立战时政治与经济体制，但

①王赓武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6页。

②《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中央周报》1932年第199期。

③蒋中正：《游陕之感想与对于陕西之希望》，《华侨半月刊》1934年第55、56期合刊。

④《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1939年2月3日），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⑤《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第3版。

⑥[美]周锡瑞著，石岩译：《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51页。

⑦张道时等：《不到延安誓不停》，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45页。

⑧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抗战史料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377页。

“攘外必先安内”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实施使其逐渐丧失威信。在“七七事变”后,华侨青年蔡和昆曾抱着为国家牺牲的精神加入国民党军队,但不久即“对国民党军队完全失望”,“大家怀着满腔热忱,准备为国牺牲,但在军队中,放眼所见都是贪污腐败。带兵的坏事做尽,甚至克扣士兵的军粮,就是不打仗。”^①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呼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其政治实践也使华侨看到希望:鼓励华侨青年到延安参加抗战、组织延安华侨联合会开展侨联工作、组织华侨到干部学校学习革命理论、支持华侨在边区兴办实业、调动延安华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②,这些都成为南洋华侨延安印象建构的重要内涵。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延安新形象的塑造也殊为自信,认为这里“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是民主的抗日的模范根据地,全国人民也这样相信,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世界青年代表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③。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抗战救国的真诚态度以及边区建设的新形态,使延安逐渐成为南洋华侨心目中领导抗战的中心所在。在华侨看来,“延安是革命的大本营,是训练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咱们华侨青年要有勇气投入到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去!”“延安的革命精神、爱国思想、政治平等、民主生活等,紧紧地吸引着我们,在我们的心头,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我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决心到延安去参加抗战。”^④“延安——这个神圣的名字,象征着革命,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跨越重洋,千里迢迢从海外回来,为的是投入您的怀抱,取得革命‘真经’。”^⑤“延安”成为华侨心目中的“圣地”,而中国共产党也成为领导中国前进的最合适的力量。这正如时人所言,“人们只要提到延安,心头就不禁漾起一股刺激的感觉。延安,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几年来也好像被人们用作称呼一个党派——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⑥

二、南洋华侨延安印象的建构路径

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认知历经从地理概念到民族故乡,再到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变化,成为华侨念兹在兹的地方。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中国共产党外宣体系的建立、进步报刊书籍的传播、进步团体组织的动员以及华侨家庭与学校的影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侨在接触、了解与吸收延安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延安印象的初识、再识与深识过程。

(一) 中国共产党外宣体系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便工作重心在国内,但到达南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开始借助当地的华文报纸《益群报》等来宣传马克思主义。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与南洋总工会和各地工人组织结成同盟,通过工会、华侨团体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因为“方法殊为新异”,得到不少华侨的拥护^⑦。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办事处下设外交部,负责对外联络与宣传。1937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接待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援华医生以及声援中国共产党的友好

① 李炯才:《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68页。

② 陈文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八桂侨刊》2009年第3期。

③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4页。

④ 张道时等:《不到延安誓不停》,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38页。

⑤ 钟萍:《拳拳赤子心,迢迢奔圣地》,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134页。

⑥ 谢克:《延安十年》,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第1页。

⑦《农工部收抄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剪报及呈文》(1928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8/2552。

人士,其中包括新加坡《星洲日报》华侨女记者黄薇、《南洋商报》记者胡守愚以及南洋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等。

随着国难日益深重,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初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四五月间,成立中国共产党长江中央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①。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其下属南洋工作组主要负责南洋华侨的工作。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到1941年3月,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国际报道社,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巩固统一战线、开展对外宣传以及联络华侨的重要机构。由中国共产党与左翼知识分子共同成立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在向南洋华侨的宣传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延安、重庆到香港,再到南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所建立的相对畅通的外宣体系。随着战争形势的紧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为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在指导一二九师文化工作努力方向时也提到,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②。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之下,“住窑洞、吃小米、学理论、练本领、打日本、求解放”成为南洋华侨对延安与延安生活的形象概括。

(二)进步报刊书籍的传播

抗战时期前往延安的华侨青年基本上都受到在南洋传播的进步报刊书籍的影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新华日报》等有时会随国民党的中央报纸或华侨期刊一道被带到南洋社会。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创办的《祖国通讯》《国新通讯》等都是面向华侨宣传的重要媒介。廖承志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在南洋华侨中的影响也很大。南洋当地的华侨报刊,如《南洋商报》《醒狮》《现代日报》等,也有不少关于延安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后不久,《南洋商报》就有不少关于延安教育、经济、政治与生活方面的消息,延安也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政治的最新典型”^③。1941年元旦,胡愈之接受周恩来的委托,担任《南洋商报》的主笔。由于其利用曾经在国际新闻社的人脉网络以及与香港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密切关系,《南洋商报》的消息渠道迅速而准确,为在南洋宣传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邹韬奋主编的《抗战》、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艾思奇主编的《认识月刊》、丁玲主编的《战地》、周扬主编的《自由中国》、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全民抗战》等在华侨中都有不少受众。值得一提的是,《救国时报》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在南洋华侨中传播,其中所登载的关于延安的政治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中国的革命前途等文章被华侨通过油印报或手抄报的形式,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

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左翼知识分子在南洋当地创办了不少进步书店,组织“青年读书会”,介绍和出售进步书籍,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著作都在其中。在马来亚槟城谋生的华侨青年沈光正是从这些报刊中,“看到了许多反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情况的报道,歌颂革命圣地——延安的通讯和诗歌。我还看到了许许多多进步青年、爱国志士、著名艺术家、作家、记者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寻求真理,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参加抗战,参加革命。我心灵深处也不由地滋长了到延安去的愿望。”^④越南华侨青年王建华也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

^②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载《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③《从苏维埃进展到民主制度的延安民主政府成立情形》,《南洋商报》1937年11月20日,第4页;其他相关的报道有《陕北统一战线区 延安抗日大学姿态》,《南洋商报》1937年8月12日,第22页;《另一种姿态的延安 商贾云集》,《南洋商报》1937年9月23日,第22页;《初入延安的印象》,《南洋商报》1937年11月23日,第19页;等等。

^④沈光:《槟城—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102页。

认为这些进步报刊书籍是促使其前往延安的动力，“我在一个同学那里得到一本《从陕北归来》的宣传小册子，从邹韬奋编写的《抗日三月刊》里看到国内抗日消息，并看到有关延安的报道，以及通往延安的路线。……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延安在日夜呼唤着我。”^①

在这些报刊书籍中，不得不提在抗战期间前往延安的外国记者的著作对南洋华侨延安印象建构的影响。外国记者是撕开国民党舆论“围剿”的铁幕而使延安这块神秘的土地被世界认识的特殊群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记者在考察延安后，撰写了大量关于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与报道。这些著作不仅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而且在南洋华侨中影响甚大。对南洋华侨而言，“陕北的红区，在抗战以前，因国共对立，所有消息，惨被封锁，人们对于其中情况，都茫无知晓，言人人殊，异常诡秘。自从美国名记者史诺（斯诺——笔者注）冒险闯进红区，把各种宝贵的、真实而有趣的新闻挖掘，而编成那本《西行漫记》之后，人们对陕北红区始恍然大白。”^②新加坡华侨陈文旌在看完《西行漫记》后，认为这是“一部凡是中国人都要阅读的著作”^③。印尼华侨蔡其矫在新加坡时，在胡文虎所办的星期义务学校中遇到暨南大学学生救国会的成员刘文光。刘文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了解到蔡其矫要求进步的思想后，即为其购买了《西行漫记》。这本书陪着蔡其矫从新加坡到曼德勒、仰光、香港直到延安^④。新加坡华侨郭凌也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我在马来亚阅读过《西行漫记》，书中描写了一个神行太保式的人物——罗炳辉，使我非常敬仰。”^⑤郭凌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到安徽滁县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在那里遇到了罗炳辉，圆了其不远万里前往延安的夙愿。

（三）进步团体组织的动员

抗敌后援会、救国会、筹赈会以及各类文学社团与文化协会都是南洋华侨认识了解延安的重要途径。南洋各地几乎都有抗敌后援会、救国会与筹赈会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抗日募捐，号召抵制日货；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和抗日救国的主张等，为动员华侨以各种形式参与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1938年5月成立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曾搜集和拍印百余张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照片，在各劳工团体中巡回展览，使华侨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救国的实际情况^⑥。马尼拉南洋中学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就有20多名华侨学生回国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奔赴延安，就是认为中国抗战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⑦。

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戏剧、讲家国仇与民族恨是南洋抗战文艺的中心工作，这些文学社团和文化协会在日常活动中，经常通过戏剧演出或文学作品，宣传中华民族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深刻而明显的民族个性——不屈于外侮^⑧。《从东北逃亡到这里》《慰问伤兵》《凤凰城》《警醒》《雷雨》《阿Q正传》等是南洋各国防剧社和少年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各类抗战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直接关于延安的，诸如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在华侨中的影响比较大：“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

①王建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奔向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158页。

②南洋山人：《揭开“中国救亡军”的面影》，《南洋商报》1938年11月16日，第19页。

③文旌：《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南洋商报》1938年6月25日，第17页。

④蔡其矫：《我和朋友们奔赴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148页。

⑤郭凌：《转战在敌伪顽包围之中》，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200页。

⑥邱荣章等编：《菲律宾华侨与抗日战争》，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2015年，第39页。

⑦王唯真：《归国奔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98页。

⑧莫嘉丽：《中国抗战文艺思潮与马华的文艺运动》，《八桂侨刊》2000年第4期。

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①泰国华侨青年庄国英就因为这首诗而奔向延安。在各种爱国歌咏团中,关于延安歌曲的传唱度也比较高,诸如《延安颂》:“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抗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②另外,《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告别南洋》等都激发了华侨奔赴延安抗战的决心与勇气。

南洋不少电影中也有延安形象的呈现。《中国救亡军》就是在延安拍摄的“热烈紧张的抗战救亡实情”,因为“各国人士对于第八路军发源地的延安,似乎感到十分的兴趣,在外国报章时常看到”^③,《中国救亡军》的放映满足了南洋华侨对延安的好奇与想象。不过与其说《中国救亡军》是部电影,倒不如说是关于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军队抗战救国的纪录片更为恰当。南洋华侨青年刘思在看完《中国救亡军》后曾写下关于延安的诗篇:“延安吗/那就是延安吗/延安高踞群峰顶/绚烂彩云间/那儿有高山/那儿有雄关/巍峨的关与山/环拱大延安/城门外少年的马队/……驮上世代悲惨的重压/争驰向斗争的战场/延安吗/那就是延安吗/烈火似的笑□哟/红艳的朝阳!”^④

(四)华侨家庭与学校的影响

也有一些华侨青年延安印象的建构受其家庭的影响。菲律宾华侨王唯真了解延安、前往延安是受其父亲王雨亭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王雨亭在菲律宾与南洋侨领庄希泉共同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战救国。不久后再度与庄希泉合作创办中华影片公司,放映进步电影诸如《上海之战》《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七七事变”后,王雨亭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的委托,先后介绍了数百名华侨青年前往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⑤。1938年10月,王雨亭送年仅15岁的王唯真回国参战,临别赠言中即谈及对孩子所寄予的莫大期望:“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⑥王唯真也不负父亲期望,到达延安后不久即加入共产党,先是凭借绘画才能在《解放日报》中绘制战争形势图,后又凭借英语才能在新华社担任英文翻译和广播科国际新闻的编辑。

也有一些华侨学生对延安的了解受华侨学校党员教师的影响。这些党员教师为学生提供进步书籍,宣讲邓中夏、张太雷、澎湃、瞿秋白、方志敏等烈士的事迹,成为学生走上延安道路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董锄平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工作时,即在学校中成立“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发行《救亡月刊》,传播《救国时报》,影响了不少华侨青年。1938年前往延安的白刃即是受其影响,萌生了前往延安的想法^⑦。白刃在延安一直从事文化工作,撰写战斗文章。菲律宾华侨南洋中学中的不少老师是被称为“红色人物”的进步青年,作为“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传播者”,向学生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领导革命的成就,红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纪念周会和全校演讲上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学生阅读进步报刊书籍等,这

^①柯仲平:《柯仲平文集》(第2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②莫耶:《延安颂》,载郁葱编:《抗战诗篇》,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517—518页。

^③《抗日策源地——延安第八路军对日抗战的伟绩》,《南洋商报》1938年11月13日,第15页。

^④刘思:《我见了延安》,《南洋商报》1938年11月21日,第22页。

^⑤王唯真:《归国奔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48页。

^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编:《抗战家书》,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⑦高朗著,白安丹校订:《中共一大党员董锄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6—167页。

些老师“火一样热情的革命宣传”对学生影响深远^①。新加坡侨星平民学校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廖优健等人创办的,这所学校招收的大都是贫苦华侨子弟,但“在老师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学生思想也比较进步”,曾演出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三个叛逆的女性》等话剧,进行抗战救国的宣传^②。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亲自带领华侨青年从南洋回延安的。1939年春夏之间,泰国华侨青年庄国英等12人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欧阳的带领下前往延安^③。

三、延安之行与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传播

南洋华侨的延安印象是“层累地造成”的,是多方、多维度对延安话语表达与宣传的结果,但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认识又是间接且零碎的,前往延安的华侨则获得对延安更为直观和整体的认知,由此加深对延安的了解并参与到延安印象的传播之中。南洋华侨从延安印象的受众成为传播者,这也是因为延安印象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实践同华侨的期望相一致的必然结果。

(一) 南洋华侨对延安的实地感知

抗战期间前往延安的道路何其艰难,但不少南洋华侨将之看作是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先期考验。南洋华侨前往延安的第一重阻碍来自其家庭。对不少老一辈华侨而言,对抗战中国的募捐与声援都是应有之义,但让其子女回国抗战则比较难以接受,何况老一辈华侨或多或少都受到国民党在南洋对中国共产党歪曲宣传的影响。越南华侨王建华的父亲对女儿一心前往延安特别不理解,“现在国内正在打仗,日本人到处轰炸,别说到陕北了,只要踏上中国的领土,马上就会被炸死!”^④尽管如此,父辈的担忧依旧未能阻挡王建华奔向延安的决心与行动。南洋华侨青年前往延安的第二重阻碍来自漫长且充满未知的路程。以菲律宾华侨前往延安的路线为例。“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曾组织22名华侨青年的回国慰问团前往延安^⑤。从菲律宾前往延安的路线之一,是沿着菲律宾、香港、湛江、廉江、陆川、贵县、柳州、河池、独山、都匀、贵阳、息烽、遵义、桐梓、綦江、重庆、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剑阁、广元、汉中、西安、三元、铜川、延安这条路线,虽然有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但贵州高原、秦巴山脉的险阻非同寻常,不少路段只能步行^⑥。随着战争局势的紧张以及国民党蓄意制造的反共摩擦,从西安到延安的这段300多公里的路程通常都得依靠步行,用时长短取决于国民党的封锁状况,有时不得不在中途停留隐蔽。

从南洋到延安,华侨一路经过国统区或沦陷区,目睹民众流离失所与战争伤痕,相比之下对延安的印象更好,呈现在华侨面前的延安也更为具象化:“延河边上的延安古城,河谷两边黄色的山崖,山坡上若隐若现的窑洞,南门外高高的宝塔山,都使我们感到无限的亲切和激动。”^⑦进到延安城中,“城圈不大,街道不长。用石灰水刷写的抗日标语,随处可见;雄壮的救亡歌声,响彻云天。一队队八路军健儿,踏着整齐的步伐;一群群爱国青年,露出欢乐的笑脸”^⑧。尽管在延安要面对冷天气、小米饭以及与南洋完全不同的生活

^①施纯亮:《从南洋奔赴延安》,载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晋江华侨抗日救国史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页。

^②廖冰:《奔向延安,奔向革命》,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113—114页。

^③庄国英:《从泰国到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66页。

^④王建华:《冲破束缚,奔向延安》,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159页。

^⑤邱荣章等编:《菲律宾华侨与抗日战争》,第42页。

^⑥庄焰:《烽烟寸丹——延安的回忆》,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29页。

^⑦苏惠:《去延安参加“七大”》,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61页。

^⑧白刃:《到延安的前前后后》,载《白刃文集》(第7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习惯,但这些都不成为问题。根据统计,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抗大和陕北公学中,有青年2000多人,其中华侨青年有200多人^①。从边区政府到司令部、作战部,从学校到医院、报社、工厂中都有华侨的身影,华侨劳动模范、华侨战斗英雄与烈士都成为激励后来华侨的榜样。

在前往延安、改变对延安印象且影响较大的当属于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延安之行对陈嘉庚来说是一场正视听之旅。在延安,陈嘉庚“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②。在访问期间,华侨青年以亲身经历讲述延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中国共产党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的新精神、新风貌。陈嘉庚的实地考察也使其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随同陈嘉庚前往延安的李铁民在离开前,还特地赋诗告别延安,其中有言:“延安的兄弟姐妹们/愿你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奋勇杀敌/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南洋华侨一定会和你们打成一片/南洋华侨一定会和你们打成一片。”^③

(二)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传播

南洋华侨对延安印象的传播是其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典型表现。1938年7月,新加坡华侨女记者黄薇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即提出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要求。但毛泽东认为,“当记者也是学习,而且是更好的一种学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④黄薇撰写了大量关于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报道,向世界尤其是南洋华侨宣传延安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实情。与黄薇同行且以《南洋商报》特约记者身份访问延安的胡守愚,“对于延安的印象,认为最有道德的地方,如镜花园(缘——笔者注)中的君子国,这里的人都富有相亲相爱的口热,而无争权夺利的卑劣行为,大家都有极崇高的信仰和周到的礼貌,谦恭诚恳的待人接物的特殊修养,没有纷争,没有大骂,这不是君子国是什么呢?”^⑤胡守愚根据其在延安以及西北的考察见闻,撰写了《边区的乐观与吃苦》《陕甘宁边区的总观》《毛泽东的风采与谈论》《西北纪行》等系列文章,在《南洋商报》上连载,在南洋华侨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在陈嘉庚访问延安以及回到新加坡后,《南洋商报》更是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关于延安以及陈嘉庚多次宣讲延安见闻,宣讲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与抗战贡献的报道,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在南洋声势尤大”^⑥。不少南洋华侨还专门捐款给延安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支持。

为加强对海外华侨的联系和宣传,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并参加边区建设,1940年9月,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⑦。吴玉章在成立大会上发言时说:“华侨是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延安华侨应起核心作用,以推动全世界千余万华侨积极参加祖国抗战。”^⑧为推进南洋华侨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延安抗大、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选拔30多名优秀的华侨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学习班——这也是中央海外

^①郭戈奇:《战斗在延安的岁月》,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第98页。

^②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4页。

^③李铁民:《华侨会和你们打成一片》,《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第3版。

^④黄薇:《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40页。

^⑤胡守愚:《延安的特殊风尚》,《南洋商报》1938年9月21日,第31页。

^⑥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36页。

^⑦《延安华侨救国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新中华报》1941年4月3日,第3版。

^⑧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朱德、叶剑英领导,分析研究国际时事,调查研究各地区社会、华侨情况和华侨政策^①。虽然这些华侨因为太平洋战争后国际形势的紧张而未能返回南洋工作,但也接受中共的其他委派,继续从事革命宣传。即便是在华北与西北局势日趋严峻的1942年,留在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和边区政府的华侨还有220人——在延安以外工作的有60人。从人数占比看,以马来亚和泰国的华侨最多,越南次之。从成分看,以学生和工人为最多;从文化水平看,中学程度占多数,这些华侨都是延安与中共形象的书写者与传播者^②,其中包括20多名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中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华侨青年。为促进华侨青年的宣传和研究,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还联合《解放日报》,组织华侨撰写《我的一日》,从日常生活到革命工作皆有涉及。不仅如此,华侨还将其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传到南洋去,不少南洋华侨就是通过在延安的同伴的消息^③,对延安有更深度的了解。

结论

南洋华侨延安印象的建构既是因为抗战的影响,又是为抗战服务的,也因之成为凝聚侨心的重要纽带。华侨的延安印象历经了从地理概念到民族象征,再到政治符号的变化。延安印象之所以能够在南洋华侨心中生根发芽,并促使其不远万里奔赴延安,最重要的就是延安印象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一致性。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难深重的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战救国,南洋华侨最关注的也是同样问题,而能否应对这一问题是影响侨心向背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契合了南洋华侨抗战救国的历史与现实需要,毕竟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沉浮与传统文化的熏陶,爱国守土的观念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故而关于延安印象的话语阐述能够凸显出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成为华侨投身革命,矢志不渝的信仰所在,也成为展现华侨情感倾向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因子。

(责任编辑:郑春玲)

^①彭光涵:《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华侨与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张志强:《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第128页。

^③严蒙:《本刊同志从延安来信》,《南洋商报》1939年5月18日,第23页。

various factors—including Thai government education policies, school education,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hinese-language media—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ailan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growing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achieved localized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into Thailand's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cultural blending.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Thai government and the Thai Chinese community, the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has cultivated a flexible and dynamic hybrid cultural identity, leveraging this identity to enhance their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ai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ve fostere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mong local overseas Chines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Thailand.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Identity; Multiculturalism

The Promo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1950 Marriage Law of New China among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Shen Yanqing Deng Jiajia(33)**

Abstract: On May 1, 1950, the first Marriag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establishing a new marriage system based on freedom of marriage, monogamy, and gender equality. With the steady progress of nation-building in New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as well as the relatively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with New China continued to grow.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1950 Marriage Law,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actively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widely promoted the law, and earnestly put it into practice. These efforts played a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and in stabilizing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 in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Keywords: 1950 Marriage Law;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Promotion;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mpressions of Yan'an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v Xia(42)**

Abstract: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itially identified with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while knowing little about Yan'an in northwest China. Confronted with the unprecedented national crisis, Yan'an's status as the anti-Japanese center led by the CCP increasingly gained recognit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impressions of Yan'an among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as from the influence of progressive newspapers, books,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and families. The genuine political ecology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Yan'an gradually became known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Many overseas Chinese made arduous journeys to Yan'an and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mpressions of Yan'an. The dissemination of impressions of Yan'an by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Relief Delegation to the Homeland, headed by Tan Kah Kee,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mpressions of Yan'an among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as both 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CCP's image and a positive political response to the Party's wartime practice of resisting Japan and saving the nation.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mpressions of Yan'an; Political Symbol

Transnational Healthcare Practice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Magnetism and Welfare Retrenchment

.....**Zhu Qian Wang Dongxin(52)**

Abstract: Welfare systems, includ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elderly care,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a society's level of civilization.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European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e "welfare magnet" hypothesis, which suggests that countries with more generous welfare benefits are more likely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migrants. However, the healthcare practice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Germany exhibit distinct tran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me immigrants prefer to return to China for medical treatment or flexibly navigate between the healthcare systems of China and Germany, thus empirically challenging the welfare magnet hypothesis. This tre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rmany's recent welfare retrenchment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response to a slowing economy, which have significantly raised the threshold for immigrants to access healthcare benefits. The